

「嶺南名寺志系列・古志五」

鼎湖山誌

明生書



上册

(清) 釋成鷺 編撰

李福標 仇 江點校

鼎湖山誌

明生書



中華書局

本書所屬之《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爲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嶺南名寺志》編委會

顧問 黃國聲 陳永正

主編 仇江

編委 李福標 鍾東 楊權

前言

鼎湖山慶雲寺是嶺南四大叢林（另為廣州光孝寺、曹溪南華寺、潮州開元寺）之一，在佛教界頗具聲譽；而在嶺南佛教史上，其地位尤著。明末清初，因緣際會，無明慧經禪師壽昌法系下曹洞宗第二十七世江西博山無異元來（一五七五至一六三〇）之高弟長慶道獨（一五九九至一六六〇）、天湖道丘（一五八六至一六五八）等，南下嶺表傳法。道獨主華首一脈，引衆多亡明遺民進入佛門，其徒、孫輩函昞、函可、今釋、今無等，皆法天龍象。他們在珠三角及粵東、粵北地區新建或重振寺廟如番禺海雲寺、廣州海幢寺、丹霞山別傳寺、羅浮華首臺等，表現了佛教的大實行，一時淄素四眾趨響云從。惜後因滿清文字獄發，華首一脈高僧著述多遭禁毀，元氣大傷，僧徒素質頓不如前，祖庭海雲寺亦衰落以至灰滅，於今未復。道丘則主慶雲一系，其修持方式與道獨華首系不同，其影響亦復有別。

慶雲寺所在的肇慶地處兩廣交通的咽喉，是明清之際兩廣總督府和南明永曆政權所在地。一代志士曾滙聚於此，在政治鬥爭中嗆風逐浪。南北文化的碰撞與反思，是此時端溪書院儒學和慶雲寺佛教勃興的直接文化背景。其實佛教在肇慶的傳播頗早，兩晉時期西江土著俚僚族中就有了甚深的信仰。蕭梁天監年間（五〇三至五一九）端州始建峽山寺。唐代肇慶的佛教更值得大書特書，新興縣出了六祖惠能，高要縣亦出了高僧希遷。如果把慶雲系法脈往上追溯得遠一些，就可直與大鑑慧能與石頭希遷相接。慶雲寺祖庭鼎湖山白雲寺，乃盧祖會下高弟智常奉師「各為一方」、「不失本宗」之教，於唐高宗時所建。明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前後，憨山德清分化嶺表，登遊鼎湖，小住白雲寺。一日山行深入谷中名虎窩處，心賞其地「峰巒環抱，外比內附，狀若蓮花」，更名蓮花峰，並預言「不久當有福慧大人闡化於此」。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山麓上迪村居士梁少川入山誅

茆建蓮花庵，適新會朱子仁（一六一一至一六八五，即後來的弘贊和尚，字在慘，號木人，相傳為明藩王後裔）發足參方，道出高峽，遂邀入同住，不久改蓮花庵為慶雲庵。丙子歲（一六三六）道丘棲壑應邀主之，歲臘登壇傳戒，「有五色雲現於峰頂，遠近共睹，適與前名符合」，遂改庵為寺，榜山門為「雲頂」。

棲壑錫下的慶雲寺以禪宗為主，亦兼修淨土宗與律宗。棲壑師承無明慧經、博山元來，又受蓮池株宏與曹溪憨山的深刻影響。此數大老都是提倡禪、淨雙修的宗師，如無異元來就主張「禪、淨無二」、「說淨土亦得，說禪亦得；說淨土即禪、禪即淨土亦得」，而初進者不可會通，「當求一門深入」，纔不至於顧此失彼（《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可見棲壑之兼修是在眾大德指引下的高自樹立。後世讚棲壑云：「力弘博山之道，更嚴淨毗尼……禪、淨、律三教並行。自有佛法以來，未有如吾師之兼善者也。」（圓捷一機《開山立法棲老和尚行狀》）

還應提及的是，棲壑於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曾到南京大報恩寺聽華嚴宗名僧雪浪洪恩、一雨通潤開壇說法，親依久之，並被會中推為副講。故此慶雲寺還深染華嚴宗的因子。如此之「兼善」，必非清淨鑽研所不能到。故道丘對慶雲座下比丘的修為、學識要求甚高，在開法之初，就遵元來無異和蓮池祿宏之遺教，制定了一整套謹嚴的佛教儀軌和寺規，即所謂「博山鐘鼓，雲棲法規」。這針對五季、趙宋以來禪僧大都深據山林而不講佛理，以致空疏不學、狂禪泛起的現象而言，可謂走了補救的、復古的、向上的一路，讓人看到了佛教的別一種風範和希望，無疑為近代虛雲等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提供了啓示，良可貴也。

與道獨華首系按自定「道函今古傳心法」字輩傳法之不同者，道丘慶雲一系謹遵乃師元來無異所定法統，即「元道弘傳一，忞光照普通。祖師隆法眼，永傳壽昌宗……」的字輩傳法，實屬曹洞宗博山法

系的嶺南正脈。當然，在慶雲寺開山之初，由於發展的需要，也由於棲壑禪師兼善博大之風的影響，尚有其他法系的高僧住持該寺。棲壑本人是博山系第二世、石頭和尚三十五世孫。二代住持弘贊嗣法於雪關和尚，屬博山第三世。然第三、四、七代住持，雖從棲壑受戒，卻不是博山系的嗣法子孫。自第八代住持一安立雪之後便屬子孫叢林。慶雲系法脈不斷，延續至今，已傳法至第八十三世「壽」字輩。棲壑所定的嚴格清修制度亦在慶雲寺中代代不移，故該寺歷代住持中高僧迭出。如二代祖弘贊和尚，少習儒，稍長在本郡法雲寺剃度脫俗，又往廬山參道獨和尚。後主慶雲寺二十六年，一稟棲老和尚遺規，博學多聞，精研三藏，以文字三昧回向般若，至老不倦，著作甚豐，成長為嶺南最具名望的律學大師，以致在佛界、民間頗具威信，時「嶺海之間，以得鼎湖戒為重」（霍宗瑄《第二代在慘和尚傳》）。其他如三代祖傳諫湛慈、四代祖元渠契如、五代祖傳意空石、六代祖圓捷一機、

七代祖成鷲跡刪等，皆教化一方，於佛學頗多建樹。慶雲寺作為嶺南曹洞宗的傳法基地，其影響一直到現代。因僧眾大多為粵人，在長期的佛教修持念誦中，形成了南腔（粵語）誦佛的傳統，在嶺南佛門中最具地方特色。其嗣法子孫不僅是廣州、南海、番禺、順德、高明多個寺院的住持，而且西到南寧，東到惠州惠陽縣，北到韶州英德縣，南到海南會同縣（今屬瓊海縣），乃至港澳地區，至今仍有多個寺院的祖師堂，供奉著慶雲寺某代住持及其弟子。如慶雲寺第七十四代住持印載筏可，是香港寶蓮寺第三代住持，慶雲寺第七十代住持印潔質良的傳法弟子慧因則住持澳門普濟禪院等。

道丘主寺二十二年間，慘澹經營；又經二代祖弘贊繼武前修，弘揚法力，終將慶雲寺建成殿宇莊嚴、結構完整的大叢林。自此鼎湖香火之盛從祖庭白雲寺轉移至慶雲寺。寺內流傳到今天的文物古跡甚豐，如舍利子、千人鑊、大銅鐘、白茶花樹、平南王贈棲壑和尚大法座、

《磧砂藏經》、梅花圖碑刻、慈禧太后「敕賜萬壽慶雲寺」牌匾等，無不是慶雲歷代高僧潛德幽光的見證。在這裏，特別要提及的一段歷史是：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成鷲跡刪接任住持，時慶雲寺已開山七十餘年，寺院建設日善，香火更旺，常住達數千指之眾，生活也日趨安逸。隨之僧眾矛盾紛爭日多，戒律日益鬆弛。本年閏三月六代祖圓捷示寂，而成鷲之來遲至歲末，住持虛席將近十月，僧眾更是一盤散沙，寺亦幾致廢弛。成鷲到來不久亦遭排擠。《鼎湖山志》書前丁易《序》云：「正法方興，群邪側目。有盜常住一抔土者，懼其不利於己也，合眾口以燦金。」又孫毓琮《序》云：「（成鷲）時為群犬所吠，予奉上命，力為驅除。自後鼎湖一席，無復有窺竊常住之人。」應該說，成鷲住下的慶雲寺面臨一樁何去何從的公案。要得解決，必借本寺開山祖師法力與外護之助，而纂修《山志》乃其大契機。可見纂修《山志》之舉是有一個關乎慶雲寺發展命運的背景的。且世間方志六十

年一修，慶雲寺開山已然七十餘年，《山志》之辦亦迫在眉睫。

其實成鷺與《鼎湖山志》因緣頗早。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四代祖契如和尚就發願修《志》，文名甚著的成鷺被特請入鼎湖主其事。惜契如翌年圓寂，志稿未成而成鷺離山。時隔近十年，成鷺被推為慶雲住持。後因續前緣，寺志之纂得重新啓動。此次修志根本目的在於以祖師開山之傳統教育僧眾，申明大義。為了不讓昔之嚴謹戒律儀軌因今之安逸而墮敗，成鷺訂立了《重申祖訓約》，又著《僧鐸》讓寺僧於禪堂、老堂等處時時提唱，以重振戒風。並將其編入《山志》，形成定制。另者，成鷺還親自選定鼎湖山「十景」，邀集各方文士賢達覽勝觀光，唱和題詠。其主觀目的是為慶雲寺在鼎湖山的清修正名安分，排除外界干擾；客觀上也為相傳黃帝鑄鼎處的鼎湖山增加了新的、實際的文化含量。成鷺把登臨題詠之什編入《山志》藝文志中，這也是鼎湖山作為風景區的首次正式記述。此《志》之修得大護法肇、

高、廉、羅道丁易的大力支持，於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得以最後完成並付梓，達到了預期目的。《志》前孫毓琮序云：「（憲府丁公）乃取山中舊本，親為總裁，三月告竣……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於斯《志》亦云。」

纂《志》者成鷺（一六三七至一七一九），番禺韋涌名家子，俗名方顓愷，字麟趾。少年適逢國難，中歲皈依佛門。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禮羅浮山石洞禪院元覺離幻和尚出家，派名光鷺，字即山，得其法嗣；次闡化於瓊州府會同縣多異山海潮岩靈泉寺，改名成鷺，別字跡刪；三轉南海馬山龍華禪院。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遷香山縣東林一庵，又曾往澳門普濟禪院秘密進行反清活動。晚年住持番禺縣大通寶光古寺（大通寺）。著作有《紀夢編年》、《金剛直說》、《莊子內篇注》及《咸陟堂詩文集》等行世，在當時嶺南佛門中號稱文字般若第一，後梁啟超亦稱其「蓋樂以文字而為佛事者」。成鷺作為高僧大德

和著名文士，又以慶雲寺住持身份親手編纂這個《山志》，整齊凡例，挈領提綱，以折衷群言，自是左右逢源，得心應手。總體來說，此《志》資料豐富而核實，文字簡明而具文采，敘末時或著「僧史曰」以發論，講明戒律，章顯宗旨。此《志》的確在當時為整頓和扭轉寺風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且為後人研究嶺南佛教史及地方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原始文獻。在修志體例上也為後來者提供了範本，光緒年間增城《華峯山志》即仿《鼎湖山志》之體例而纂修。成鶯自稱「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慚於往哲」，不虛也。

此《志》代有流傳。觀書前數件康熙四十九年所撰之序及成鶯跋，並言及修《志》、刻書之事，故本年無疑已有刻本，並附刻鄭際泰繪圖。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又有補刻。現今最早的傳本實是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單白魚尾，左右雙邊。書序中數序為康熙五十六年所撰。《志》中攬入成鶯本人事

蹟，有詩文署名出現「七代住持成鷺」等字樣，殆五十六年增補（此時成鷺已經退院）。後該書又有乾隆修補本，為徐氏南州書樓舊藏，今存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此書版片據慶雲寺有關人員透露，解放初期尚存該寺，惜在上世紀「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慘遭劫難，付之一炬。除刻本外，又有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五年沈雲龍編《中國名山勝蹟志叢刊》、臺北明文書局一九八〇年《中國佛寺史志匯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六年《中國佛寺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四年石光明、董光和、楊光輝主編《中華山水志叢刊》等，均為據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的影印本。

我們此次的整理，亦取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為底本，加以新式標點和簡單的校勘，以便信眾唸讀及研究者參考。整理工作得到了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立項資助，並蒙中山大學古文獻所黃國聲教授指導、審閱，特致謝忱。

李福標 二〇〇六年四月寫於中山大學康樂園

序

余奉聖天子命，總制兩粵，駐節端州。粵東山川諸名勝，以任鉅責重，弗遑遊覽。聞州治東北二十里許有鼎湖一山，嵒龍蒼翠，山深而泉美，俗傳為軒轅乘龍處。然未足信也。巔有湖，四時不竭，邑人嘗禱雨於此。徑極險峻，林木葱鬱，而峯巒環抱，中乃慶雲寺也。梵宇幽邃，佛像莊嚴，實為焚修淨土。嚮因住持未得其人，幾致廢弛。有老比丘成鷲者，墨名儒行，學廣道高，州之紳士延其住錫焉。於是修闢山場，講明戒律，已歷歷可觀。又慮日久復湮，乃纂述《山志》，纖悉畢載，俾後人按籍而知名剎之由來，誠勝舉也。丁僉事總其成而授之梓，丐余言為弁首，因可其請而書之。

欽命總督廣東廣西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仍帶軍功五次趙弘燦撰

